

# 清末中日文人對影鈔及覆刊漢籍的主張——以楊守敬《古逸叢書》成書過程為例

許媛婷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

## 提 要

清光緒六年（1880），湖北宜都人楊守敬乘赴日之便，廣蒐流散日本的漢籍古本。其後，在短短兩年之間，楊守敬透過日本友人森立之、向山黃村等人協助，取得稀罕宋、元古本二十六種，先是透過影鈔或覆刊方式保留原書樣貌，最後採取「再覆刊」，輯刻成《古逸叢書》。

本文以楊守敬輯刻《古逸叢書》為例，探討中日文人對影鈔與覆刊漢籍在觀念與主張上的差異性。文中首先釐清影鈔與覆刊的定義與概念；其次透過《清客筆話》一書，論析楊守敬與日本友人森立之對影鈔與覆刊的討論；最後將《古逸叢書》中的三部書《爾雅》、《春秋穀梁傳》以及《論語集解》，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原刊本對照，從中發現彼此的差異性。

《古逸叢書》的出版，不僅反映出楊守敬在覆刊古籍過程上受到許多外在條件的約束，同時也反映出當他面臨「尊古」與「勤古」兩難困境時，內心曾經有過極大的掙扎與抉擇。即使到了今日，中日學者在看待《古逸叢書》時，雖仍有正反不一的評價，但透過研究，相信對於楊守敬耗費心力，努力促進域外漢籍回流中土的用心，還是應該予以認同與肯定。

**關鍵詞：**楊守敬、森立之、影鈔本、覆刊本、中日書籍流通、古逸叢書

## 一、前言

清光緒六年（日本明治十三年，1880），湖北宜都人楊守敬（1839-1915）隨第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赴日後，開啓他在域外尋訪逸失漢籍的契機；而後，在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8）的囑咐下，楊守敬短短不到二年時間，藉由森立之（1807-1885）、向山黃村、島田重禮等日本友人的協助，<sup>1</sup>不僅訪得大量珍貴漢籍，又擇取稀罕難得的宋、元漢籍二十六種。在無法獲取原書的情況下，以不得已變通方式，先用影鈔或覆刊技術保留原書樣貌，最後再將這批影覆後的珍本漢籍，採取「再覆刊」形式予以成書，而輯刻成爲今天廣爲人知的《古逸叢書》。

由於《古逸叢書》所收二十六種宋、元古本，或影鈔、或覆刊而來，其來源則多得自於兼醫員、收藏家及書賈等多重身份的森立之。其時，楊守敬在向森立之借閱、交換、代鈔，以及購買漢籍的過程中，雖然受到語言不通的限制，但兩人經由筆談交換彼此想法，且不時就漢籍珍罕與否，以及透過影鈔或覆刊之後的書籍樣貌，表達各自不同的立場或主張，無形中對楊守敬日後在纂輯《古逸叢書》時，提供了另一種不同角度的激盪與思考。

從今日眼光看來，楊守敬赴日期間蒐羅許多以往流入日本的宋、元漢籍，並費盡心力購藏與保存，可謂居功厥偉。在黎庶昌的支持下，楊守敬將這批《古逸叢書》以覆刊形式呈現，用意雖極良善，然辛苦成書之後所得到的評價及迴響，似乎集中在清光緒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年，1884）編成後印刷百部，並致贈當時中日政學界顯貴所得到的讚賞而已。<sup>2</sup>

這不禁令人好奇，當時清末文人或後世中日學者究竟是如何看待黎、楊兩人所編《古逸叢書》的學術價值？對楊守敬抱持著否定態度的，有清末學人葉德輝；<sup>3</sup>然而有更多抱持肯定態度的人，尤以研究楊守敬或《古逸叢書》的近代中國學者，大多

- 1 據楊守敬云：「日本收藏家，余之所交者，森立之、向山黃村、島田重禮三人，嗜好略與余等，其有絕特之本，此錄亦多采之。」《日本訪書緣起條例》第十八條，收入《楊守敬學術年譜》，頁 81。
- 2 據楊守敬自敘：「《古逸叢書》已成，督印百部，黎公以贈當時顯著，皆驚為精絕。」見（清）楊守敬自撰、弟子熊會貞補疏，《鄰蘇老人年譜》，頁 58-59。
- 3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曾批評楊守敬代黎庶昌刻印《古逸叢書》事，稱其「日本宋刻書不可據」，認為楊氏所蒐之日本古漢籍多有偽撰或訛誤，實不足信。頁 269-270。

著重強調楊守敬在赴日蒐書的豐碩成果與文化貢獻；或是，以其所蒐漢籍珍罕度而持肯定《古逸叢書》學術價值的態度。<sup>4</sup>然而，與中國近代學者不同的是，日本近代學者長澤規矩也教授對楊守敬以影鈔或覆刻漢籍方式輯編《古逸叢書》的做法，則是提出批判的立場。在〈古逸叢書の信憑性について〉一文中，長澤教授針對楊守敬《古逸叢書》中《爾雅》、《論語》及《杜工部草堂詩箋》三部內容，與原書底本進行比對，竟發現數處，以至數十處更動之處。因此，長澤教授即據此認為《古逸叢書》雖是影鈔或覆刊自宋、元古本而來，然其可信度卻是相當薄弱。<sup>5</sup>

由於中日兩國近代學者對《古逸叢書》的評價大相逕庭，遂引發筆者的好奇與注意。根據筆者翻閱《古逸叢書》所見，確實發現如長澤教授所指出有更動痕跡；再者，在清帝避諱字的缺筆上，也十分明顯。若從版本學或書誌學的角度而言，楊守敬以影鈔或覆刊古本的概念輯刊《古逸叢書》，應與底本是一不二，全無差異，但果真如此嗎？如果不是，那麼楊守敬對於影鈔及覆刊的概念，與今日我們所認知的影鈔與覆刊定義究竟有何不同？其次，楊守敬赴日蒐書期間，與他往來最密切的日本友人為森立之，在兩人對於蒐書，甚至對影鈔與覆刊概念反覆討論上，又適可分別代表當時中、日文人的立場與看法。惟彼此之間又有何差異，影響層面有多大？這種種問題皆是以往研究中較少涉及之處。

因此，本文試圖先從版本學上對影鈔及覆刊的定義予以釋義，初步了解楊守敬對影鈔或覆刊的概念；其次，透過楊守敬與森立之筆談的《清客筆話》，重新開啓清末中日文人之間的對話，進而檢視中日文人對於影鈔及覆刊古本的不同看法；再者，擇取《古逸叢書》局部的覆刊漢籍，追本溯源找出原書底本加以比對，驗證日本學者長澤教授對該叢書提出的批判是否成立，進而探究楊守敬更改的背後原因究竟為何；最後，文中將進一步深入瞭解楊守敬纂輯《古逸叢書》的成書歷程及日後觀念的轉變，並藉此重新評估《古逸叢書》的學術價值。

---

4 目前關於楊守敬藏書的研究甚多，碩士論文以趙飛鵬，〈楊守敬之藏書及其學術〉；以及連一峰，〈黎庶昌、楊守敬《古逸叢書》研究〉；專書則有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以及宜昌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宜都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楊守敬學術年譜》等。期刊論文更是多至不勝枚舉，較早研究有吳天任，〈楊守敬與《古逸叢書》的校刻〉，頁 23-26，近則有像陳東輝，〈《古逸叢書》與中日漢籍交流〉，收入《近現代新編叢書述論》，頁 19-34，餘則待後述。此外，其他論及中日書籍交流的研究或專書，亦大多針對楊守敬的蒐書成就深入探討，多是抱持肯定態度。

5 長澤規矩也，〈古逸叢書の信憑性について〉，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卷，〈書誌學論考〉，頁 489-502。

## 二、「影鈔」與「覆刊」釋義

清光緒七年（日本明治十四年，1881），楊守敬在駐日公使黎庶昌的支持與囑付下，展開在日本當地大量蒐書，為將來纂輯《古逸叢書》而預做準備工作。<sup>6</sup>在意外地得到一本由日本藏書家森立之等人編纂的《經籍訪古志》後，楊守敬按目索書，在短短二、三年期間便獲得豐碩成果。<sup>7</sup>

其後，楊守敬將蒐來的漢籍，經與黎庶昌商議之後，<sup>8</sup>率先將珍罕難見的宋、元孤本列入。然由於古本難得，有些甚至只能借來，在兩人討論下，便決定先以影鈔，或覆刊方式重製古本，楊守敬再命日本當地刻工以「再覆刊」形式摹印，最後將定稿編入《古逸叢書》之中。因此，《古逸叢書》的成書，在黎庶昌序中提及：

書凡二百卷，二十六種，刻隨所獲，概還其真，無復倫次。經始于壬午，告成于甲申，以其多古本逸編，遂命之曰《古逸叢書》。<sup>9</sup>

意即《古逸叢書》輯入二十六種，凡二百卷，刻書順序依據書籍的獲得時間先後列入；刻書時間則始自清光緒壬午（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1882），以迄甲申（十年，明治十七年，1884）完成；同時，黎、楊兩人還達成共識，以「概還其真」刻書原則覆刊古本。基於「概還其真」的概念，便可清楚理解黎、楊為何以「再覆刊」方式鏤刻漢籍古本的用意。換言之，黎庶昌、楊守敬纂輯《古逸叢書》，主要是希望將流通到日本的宋、元佳槧，尤其是在中國境內的久佚古本，在無法攜回原書的情況下，盡可能以原始面貌重現世人面前。

6 楊守敬之纂輯《古逸叢書》，緣起於公使黎庶昌見楊氏撰寫〈日本訪書緣起條例〉所引發，經閱讀全文後，十分感動，遂發起編刻《古逸叢書》的構想，並囑楊守敬力主其事。此段經過，在楊守敬自述其四十三歲時，於日本東京與黎公相遇，後衍生此事。詳見（清）楊守敬自撰、弟子熊會貞補疏，《鄰蘇老人年譜》，頁 54-55。

7 《經籍訪古志》的編者，是由日人森立之、澀谷全善（拙齋，1805-1858）、堀川濟（舟庵）、伊澤信道（蘭軒，1777-1829）、海保元備（漁村）等人共同纂輯而成。見趙飛鵬，〈《經籍訪古志》及其相關問題〉，頁 1-22。

8 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影宋本《尚書釋音二卷》條下指稱：「余在日本校刊《古逸叢書》，黎星使女婿張君沆得影寫此本，議欲刻之。余謂此書非得之日本，似不必彙入，且此書非陸氏（筆者按：指陸德明）之舊，乃宋人之書。……今不能得開寶以前古本，則此不足驚人也。張君意存見好必欲刻之，余亦未便深拒。」顯然楊守敬雖負責主持校刻叢書之事，然在某些事的決定性上仍須經過黎庶昌等人的同意。見楊氏著，《日本訪書志》，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八冊，卷一，頁 42。

9 《古逸叢書》書前有光緒十年（1884）黎庶昌〈刻古逸叢書序〉，清光緒十年甲申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正因黎庶昌、楊守敬抱著「還真」及「存真」的觀念，因此當楊守敬在監督刻書時，對於紙墨的品質與刻工的素質皆十分注重，甚至連上木刷印時字句的一點一畫，都嚴格要求，到達一絲不苟的地步。<sup>10</sup>據稱楊守敬曾在日本刻工面前表演一項絕活，即在衆刻工面前辨識出眼前的十八塊刻板，究竟何塊爲刻工領袖所刻就。後來楊氏所指之板，果爲領袖所刻。此一試成名，日本刻工皆對楊守敬的目力深爲折服。<sup>11</sup>然則，即使如此嚴謹不苟，但由楊守敬監刻的《古逸叢書》以影鈔或覆刊達到複製原書的作法，是否完全符合「概還其真」的理念，以下將作進一步的討論。

### (一) 版本學上的定義

在版本學上，對於「影鈔」或「覆刊」的定義，向來是凡依照原書版式行款、字體粗細，一絲不苟的描摹或雕鏤，以求與原書絲毫無差的本子，便稱爲「影鈔本」或「覆刊本」。歷史上，開影鈔宋本風氣之先，且蔚爲風尚者，莫不奉明代藏書兼刻書家毛晉（1599-1659）的影宋鈔本爲圭臬，其影鈔之佳，幾與刊本無異。根據清于敏中等撰《天祿琳琅書目》所敘：

明之琴川毛晉，藏書富有，所貯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見而藏諸他氏不能購得者，則選善手以佳紙墨影鈔之，與刊本無異，名曰影宋鈔。於是，一時好事家皆爭仿效，以資鑒賞，而宋槧之無存者，賴以傳之不朽。<sup>12</sup>

另，清孫從添《藏書紀要》不僅稱讚毛晉影宋鈔本品質之佳，無人能出其右；更點出藏書家們對影鈔本的基本要求：

惟汲古閣影宋精鈔，古今絕作。字畫、紙張、烏絲、圖章，追摹宋刻，爲近世無有能繼其作者。<sup>13</sup>

10 據（清）傅雲龍撰，《游歷日本圖經》，收入王寶平主編，《晚清東游日記彙編》，卷二十八，〈日本文微一〉，內載〈陳矩記遵義黎欽使菴齋先生刊《古逸叢書》〉：「今游日本東京，嗜古之士猶稱道收訪之勤、刊刻之精（刻工以木村嘉平爲第一），紙墨之良（日本紙以美濃岳雪爲無上品，而猶精益求精，墨必頂煙，令工細磨，日盡一丸）、刷印之善（每工日印不及千葉，微有損痕及一點一畫不明者即棄之），無美不備，宜海內有洛陽紙貴之譽也」，頁 550。

11 此事詳見（清）楊守敬自撰、弟子熊會貞補疏，《鄰蘇老人年譜》，頁 57。時爲光緒癸未（九年，1883），楊守敬四十五歲。又參（清）陳矩，《東游文稿》，收入《靈峰草堂集》，清光緒間貴陽陳氏刊本；另見（日）石田肇著，孔繁錫譯，〈《古逸叢書》的刊刻及刻工木村嘉平史略〉，頁 41-53。

12 （清）于敏中、彭元瑞等，《天祿琳琅書目·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四，〈影宋鈔經部〉之《周易輯聞》，頁 97。

13 （清）孫從添，《藏書紀要》，收入《書目續編》，第七冊，頁 17。

毛晉汲古閣的影宋鈔本究竟如何精絕，衡量的標準又是如何？雖然孫氏並未清楚說明，但從上述得知，所謂「古今絕作」的影宋精鈔本，必須「字畫、紙張、烏絲、圖章」都影鈔得毫釐不差，宛如原書再現，可見毛晉汲古閣影宋鈔本必然達到相當高的影鈔水準。

然而，即使從明清藏書家的影鈔本子加以審視，有關影鈔或覆刊的定義仍十分模糊。因此，根據近代版本學家的著述中提及「影鈔本」及「覆刊本」定義，或許能更明確界定對此兩種版本的標準及要求：

1. 首先，屈萬里、昌彼得《圖書版本學要略》針對影鈔本及覆刊本，認定為：

凡據舊本影寫而行款無異者，曰：「影鈔……本」。<sup>14</sup>

凡據舊本影摹上版，行款悉如原式者，曰：「覆刊本」。<sup>15</sup>

意即凡據舊本影寫或影摹上版的書籍，其行款及字數悉如原式即可；至於其他如字體、紙墨，或是書籍內容等方面並未提及。

2. 其次，按版刻辭典或出版辭典的著錄中，則是針對影鈔本或覆刊本的製作方式進一步說明：

#### 《出版詞典》

影寫本：亦稱影鈔本。以某舊刻善本書為底本，用質薄之紙蒙於其上，使之透出筆畫，然後以筆摹寫，從字體點畫到行款格式悉依原樣，極似底本。一般專指影寫宋、元舊本。<sup>16</sup>

翻刻本：按照宋元舊本影摹後雕版印刷的書本。以宋版翻刻者稱「覆宋本」，以元版翻刻者稱「覆元本」。<sup>17</sup>

#### 《中國古籍版刻辭典》

影寫本：藏書家遇到較好的古書，選較優質的紙張，蒙在所據底本之上，照其點畫行款，一筆不苟地描寫，力求與原書不差絲毫而寫出來的書本，稱影寫本。影寫宋版書籍的就叫影宋鈔本。<sup>18</sup>

14 屈萬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訂，《圖書版本學要略》，頁 105。

15 屈萬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訂，《圖書版本學要略》，頁 99。

16 《出版詞典》，頁 228。

17 《出版詞典》，頁 230。

18 瞿冕良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頁 635。

影刻本：照原書版式影刻的書本，或稱影刊本。珍貴的古籍，為了保存原書的面貌，以適應研究上的需要，清乾隆、嘉慶以後，常用影刻的方法加以傳布，如黃丕烈所刻《士禮居黃氏叢書》本，其法大都先照原書影摹，然後上版開雕。攝影術發明後，亦有用原書照相雕版的。刻成之後，與原書相彷彿，精工者幾難識別。<sup>19</sup>

從上述可知，近代版本學家對於「影」、「覆」的定義，仍多延續自清代藏書家的主張，同樣重視字體點畫及行款格式；雖未明確說明內容是否應悉如原書，但根據製作方式的描述，仍需「力求與原書不差絲毫」，或者「刻成之後，與原書相彷彿，精工者幾難識別」。由此可知，所謂「影鈔本」或「覆刊本」，其不論字體點畫、版式行款，甚至書籍內容，都應該仿如原書，幾近無異。

## （二）《古逸叢書》的製作

既然「影鈔本」或「覆刊本」應與原書不差絲毫，因此楊守敬在纂輯《古逸叢書》的同時，看來也會依循覆刊本的製作予以嚴格要求，以期達到他與黎庶昌心目中「概還其真」的標準。一般來說，從「影鈔」、「覆刊」到「再覆刊」的過程，最常使用的方法有二：一種是採用中國傳統的「重書上木」<sup>20</sup>；另一種則是利用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西洋影照法上木」。

### 1. 重書上木

所謂「重書上木」，即是在擁有原書的基礎下，利用光滑質薄紙張勾描，影鈔原書，使其版匡魚尾、界欄行格、字體筆畫悉與原書相同，再進而雕鏤付梓。換言之，利用「重書上木」複製書籍，必須經過先影鈔，後覆刊的過程，而所具備的條件，除了利用紙張光滑，吸墨性不佳，以及紙張越薄，透明度越高的特性之外；負責描摹的書手能否做到字體神韻逼肖原書，都是決定影鈔本及覆刊本品質成敗好壞的關鍵。由此可知，成功的影鈔本或覆刊本，不論在版匡、行款、字體都應悉同原書，

19 瞿冕良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頁 636。

20 此一名詞大抵為楊守敬所創，據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廣韻五卷》（明刊本），提及此本與元至正本相近，然字體略大，其中正俗文字不一，其避宋諱處與宋、元本同，便說「知其亦翻舊本，非重書上木也。」其餘各篇亦多出現此名詞。見楊守敬著，《日本訪書志》，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八冊，頁 189。

近似底本，方可謂上乘之作。

## 2. 西洋影照法上木

所謂「西洋影照法上木」，乃是在無法擁有原書，或者不願對原書有任何破壞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先照相拍攝，再命人根據影像依樣臨摹，以雕鏤付梓。楊守敬赴日蒐書期間，有一次無意中見到珍貴難得的宋刊殘本《莊子注疏》，由於楊氏深知駐日公使黎庶昌甚愛《莊子》，於是與日本收藏者新見旗山商議，意欲收購原書，再重書上木予以覆刊；然新見旗山以該書為祖父新見義卿珍藏而拒不出讓，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黎庶昌只好「從旗山（筆者按：即新見旗山）借宋本，以西洋法影照而刻之。」<sup>21</sup>

事實上，楊守敬在日本蒐書期間，除了以影鈔方式取得原書面貌外，便是以西洋照相法拍攝原書，再請刻工按照照片臨摹雕鏤。像是北宋槧本《尚書正義》二十卷即是一例：

原本今藏楓山官庫。是書中土久無傳本，……余初得後藤正齊影鈔本，蓋正齊曾為官書掌管，故能使人摹之也。因念是書猶是端拱經進原本，首尾完具，詢希世之珍。乃從書記官巖谷修借原本用西法照出，意欲攜歸，釀金重刊，久不能集事。<sup>22</sup>

此外，以西洋影照法攝得，並將之納入《古逸叢書》覆刊者，又有《玉篇》殘本一部。據楊氏稱：

《玉篇》卷子本四卷，其第十八之後，分從柏本所藏原本用西洋影照法刻之，毫髮不爽，餘俱以傳寫本入木刻成。後日本印刷局長得能良介從西京高山寺借得〈系部〉前半卷，以影照法刻之，乃又據以重鑄，而〈系部〉始為完璧。<sup>23</sup>

其他以同樣方式攝得，並納入《古逸叢書》的，還有北宋刊本《廣韻》五卷等書，<sup>24</sup>率皆以西洋影照法上木。

21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七，頁173。

22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頁41。

23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三，頁82。

24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三，頁88。

### (三) 要求

根據上文所述，版本學界認為「影鈔」或「覆刊」的最高境界應是板匡、行款、字體、筆墨逼肖原書，其中尤以字體神似為佳。

楊守敬在提到宋槧本《尚書注疏》時曾說道：「書凡裝十冊，缺二冊，鈔補亦是以原書影摹，字體、行款毫無移易，固不害為全書也。」<sup>25</sup>由於缺佚鈔補處是按照原書影摹而成，因此字體及行款理應全然相同。

然若是行款相同，而字體稍有不同，在他看來，便不能謂之影鈔或覆刊本。例如他提及所蒐明刊本《廣韻》五卷，指出該書匡廓與元至正本相同，「但字體略大，其中正俗文字不一，然其避宋諱處，宋、元本同，知其亦翻舊本，非重書上木也。」<sup>26</sup>顯然楊守敬認為凡是覆刊本，不論從版式、行款、避諱等處觀之，應完全相同，字體亦是，只要稍有出入，只能視為翻刻本。

## 三、從《清客筆話》看日人森立之與清人楊守敬的主張

黎庶昌、楊守敬既堅持「概還其真」的理念，故其對影鈔或覆刊古本的要求自然相當嚴格，這點兩人的觀念尚屬契合。然而，楊守敬在日本蒐書期間，透過日本醫員、藏書家兼書賈多重身份的森立之，或購買，或影鈔了許多珍貴的宋、元古槧，惟兩人藉由筆談溝通中所透露的看法或主張，是否會對楊守敬日後在編纂《古逸叢書》採以「概還其真」的態度有所影響，則值得進一步探究。

當年，楊守敬意外得到一部由日本學者森立之、小島尙真、澀谷全善（抽齋）、堀川濟（舟庵）、伊澤信道（蘭軒）、海保元備（漁村）等人共同編纂而成的《經籍訪古志》，開啓按目索書的蒐書歷程。<sup>27</sup>其後結識森立之，甚至多次親自前往拜訪，惟受限於語言不通，皆憑藉筆談彼此交流，故今日所見《清客筆話》一書，便是兩

25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頁42。

26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三，頁95。

27 有關森立之等人編纂《經籍訪古志》及刊刻經過，詳見趙飛鵬〈《經籍訪古志》及其相關問題〉前引文。據該文所述，《經籍訪古志》編纂者，自狩谷棧齋在世時已發其端；而小島尙質、尙真父子，以及伊澤蘭軒父子皆參與論定，堀川濟、森立之負責繕寫、校勘、清稿；海保元備負責修訂潤飾；書名由丹波元堅所定。前後歷經近四十年，為江戶中晚期考證學、校勘學的總成績。

人當時筆談的集結記錄，彌足珍貴。<sup>28</sup>

《清客筆話》十卷，是森立之將自己和楊守敬結識交往期間所留下來的文字記錄，包括名片、短簡、留言、借條、邀請信等資料整理而成的一部筆記。書中自卷一到卷八主要是與楊守敬筆談往來的對話；到了卷九，收錄駐日公使黎庶昌致森立之的短簡、名片；卷十則為駐日公使隨員姚文棟為排印出版《經籍訪古志》，前後往來與森立之商談的一些文獻資料。<sup>29</sup>

據書中所載，森立之與楊守敬的筆談時間集中在光緒七年（明治十四年，1881）一月，到光緒八年（明治十五年，1882）八月之間。時間雖然不到二年，但反映這段期間兩人除了古書交易過程上請售與拒讓的相互攻防與較量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雙方在影鈔或覆刊主張之中，還有許多觀念上的溝通與交流。

森立之（1807-1885），幼名伊織，後改名養眞、養竹，字立夫，號枳園，又號醒齋、節齋、二端道人（以筆端、舌端自任）、水谷山人、浴仙、泊齋、自言居士等，室名有容膝居、容膝屠蘇、溫知藥室等。森立之出身於醫學世家，後來更成為江戶末年至明治初期著名漢籍收藏家及考證學者，同時兼授醫理及醫學；且精通本草學和版本目錄學。因此，森立之不但扮演著楊守敬日本訪書期間重要的購書對象，同時也為楊守敬訪尋、購求、抄錄和刻印古籍過程中提供了許多自己的想法與實質上的幫助。<sup>30</sup>

事實上，《古逸叢書》共蒐二十六種漢籍，其中便有八種在《清客筆話》一書中

---

28 《清客筆話》現藏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有原本及傳抄本二種。最早有原田種成根據松雪堂主人野田文之助抄錄自原本的鈔本，加以日文訓讀，整理發表成〈《清客筆話—楊守敬と森立之との筆談》〉，收入《長澤規矩也先生古稀記念・圖書學論集》，頁45-80；近年，有陳捷教授依照斯道文庫所藏原本重新整理，並加以注釋，後分別收錄於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以及宜昌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宜都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楊守敬學術年譜》兩書之中。

29 《清客筆話》的整理及注釋，迄今以陳捷教授整理最為詳盡。詳參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一書。

30 關於森立之及楊守敬《清客筆話》的研究，可參見以下著作：（日）川瀨一馬，〈森立之・約之父子〉，收入《日本書誌學之研究》，頁775-842；（日）石田肇，〈楊守敬と森立之〉，收入《書論》雜誌「楊守敬專號」；王鐵策，〈楊守敬與森立之的《清客筆話》〉，頁192-202；陳捷，〈《清客筆話》から見た楊守敬と森立之の典籍交流〉，收入氏著，《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頁279-282。

出現，比例接近三分之一。<sup>31</sup>有趣的是，兩人曾多次討論到影寫古本，無形中顯現出兩人立場迥異的觀點。然而，由於兩人對古本及影鈔本的主張不同，可以說是造成日後楊守敬纂刻《古逸叢書》成書之後，近代學者對此部書評價兩極的根本原因。

### (一) 日人森立之：古本以誤字為貴

根據《清客筆話》的記錄，日本明治十四年（清光緒七年，1881）一月二十一日，時年四十三歲的楊守敬首度親往拜謁已達七十餘高齡的森立之。楊守敬透過筆談向森立之表達欲購求遺留在日本的宋、元古本。一開始，森立之先是抱著存疑與抗拒態度看待楊守敬的來訪，後來感受到楊守敬對漢籍的熱情，便開始拿出各種漢籍古本與楊守敬討論與交涉。同時，在過程中，森立之更是不斷強調「古本以誤字為貴」的觀念。根據《清客筆話》所記，<sup>32</sup>楊守敬初次拜訪森立之時，開門見山毫不客氣地問道：「聞有宋本《玉篇》、《廣韻》？」森立之回答：「收藏于官庫，今不在家。」然而經過長時間的筆談與溝通後，森立之最後拿出一本官板《廣韻》（朱筆雙行注：余以宋板校合）給楊守敬看。楊守敬疑惑地問道：「此《廣韻》據宋本校改乎？」森立之回答：「所謂宋本多誤字，以誤字為貴矣。」<sup>33</sup>

三月二十八日，楊守敬再次到訪。除了提出欲替森立之重刻《經籍訪古錄》的構想外，又進一步詢問：「高氏《史略》，再《姓解》、《史略》、《玉燭寶典》等書，若有抄本，弟願得之。」森立之一聽，先將手邊的掖齋校本《玉燭寶典》出示。楊守敬又問：「貴邦所有，皆缺一卷乎？」森氏答曰：「《寶典》原本一卷缺，余所藏本，掖齋舊藏，同人以朱筆校正者也。」但顯然楊守敬對森氏所拿出的這個版本並不滿意，又說：「此似影抄，何以有誤字？」森立之回答：「原卷則唐人傳來舊抄本也，故往往有訛字，其訛字亦一一有所原，不能容易改正，是宋版已前之抄本。可貴重！可貴重！」<sup>34</sup>由於森立之強調此本「《玉燭寶典》，世上《寶典》皆以此本為原。」因

31 此八種分別為《春秋穀梁傳》、《孝經》、《荀子》、《玉篇》、《廣韻》、《玉燭寶典》、《姓解》、《史略》，可參連一峰，〈黎庶昌、楊守敬《古逸叢書》研究〉，頁96。

32 本節凡提及《清客筆話》內容，概引自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第十三冊，由陳捷教授整理并注釋之文稿，頁515-555；間有參照原田種成，〈《清客筆話》—楊守敬と森立之との筆談〉，頁45-80。

33 時為明治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朱筆旁注：辛巳）楊守敬首次來訪，見《清客筆話》，卷一，頁519-520。

34 時為明治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楊守敬來訪，見《清客筆話》，卷一，頁522。

此，楊守敬向森立之請求借抄《玉燭寶典》，並委託森立之為其尋找寫工加以影鈔。<sup>35</sup>

事隔多月，到了八月二日時，楊守敬再度拜訪森立之，筆談中刻意提到《玉燭寶典》，且在交談中顯有責怪之意，他說道：

楊守敬：「《玉燭寶典》誤字甚多，掖齋所校十之二三耳。若以《太平御覽》及《禮月令》鄭注、蔡氏《月令》等書校之，其誤字尚有五、六也。僕僅校三四葉，已改其誤字數十。」

森立之：「我輩以有誤字本為貴，若其誤字一目而可知，知而後說立，說立而後校注成。別作無一誤之定本則可，不得以古本為誤本也，是我家之讀法也。」<sup>36</sup>

以此為例，可以看出森立之與楊守敬的爭論焦點，在於當影鈔本依循古本而出現誤字時，兩人因為對影鈔本誤字處理的主張不同，而造成立場上的歧異。從森立之的觀點來看，他認為凡是古本（指唐、宋、元朝的抄本或刊本）不可能全然無誤，相反地，若有誤字，倒應視作珍寶。因為古本以誤字為貴，不該因誤字而全盤否定古本的價值，而影鈔本亦復如是。然對於楊守敬而言，影鈔本出現大量誤字，代表此本校讎不精、審視不嚴，是不應該出現的情形，也因此使他不禁懷疑起委託森立之囑人所影鈔而來的「古本」是否為真的古本？

換言之，森立之主張影鈔本應保持古本原始面貌，即使有誤字，都應視若珍寶，更不該予以更正；至於校注，乃是留給後人知而立說之處。但楊守敬則主張影抄本固然全依古本，然影抄後的本子若是誤字甚多，是否代表古本原先即有誤字？抑或是影鈔者的誤寫？此一想法明顯看出楊守敬心中對森立之所售古本的真實性產生懷疑；再者，若古本原來即有誤字，那麼影抄後的本子更應予再三校讎，更正古本誤字，方使後人不至一再錯讀。

## （二）清人楊守敬：影鈔本須經校讎

與森立之認為「古本以誤字為貴」，不得輕易校改的主張不同，楊守敬則表示雖

35 當時兩人對話如下：楊氏：「守敬不敢奪所愛，但古書今日不刻，他日恐又失，故欲借抄刻之耳。先生不欲此書刻乎？小生亦不取此書到家中，即煩先生屬寫工而抄之上木，可乎？」森氏：「幸有巧手，急速可令寫。」楊氏：「所有《玉燭寶典》本，祈屬工鈔之為感。」見《清客筆話》，卷一，頁523。

36 時為明治十四年八月二日楊守敬來訪，《清客筆話》，卷四，頁534。

可接受古本以誤字為貴的觀點，但卻始終認為凡是影鈔古本後的本子，皆應再三「校讎」，使其無誤。

在日本明治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對話中，當森立之告訴楊守敬，之前囑書手影鈔《玉燭寶典》可望在月內完成。楊守敬馬上問道：「此即掖齋（筆者按：指狩谷望之）所倩書手抄之者乎？我將刻之。」又說：「又有《史略》、《姓解》，弟皆屬人影抄之，皆欲刻之。此《玉燭寶典》想是猶原書影抄而出，可以上木，此新抄則不可上木。」從這段對話中，楊守敬再度表達出對後來一再影鈔本子不信任感，希望其交付梓印的本子是狩谷望之首次囑人鈔寫的影鈔本，而非後來再囑書手新鈔的本子。但森立之顯然不想將第一部的影鈔本售出，在摸透楊守敬對於影鈔本強烈的校讎觀念後，森立之再三勸說：

森立之：「原本掖翁所校。然其寫手不精工，故翁以朱傍書。今以其朱書寫之，則新寫本為最正，不及校于原本也。且吾又一校，欲以正之也。何如？」

楊守敬：「是誠然。然此抄手似不如掖齋本。」

森立之：「再與原本為君一校則可矣。」<sup>37</sup>

從對話看來，森立之深知楊守敬在無法得到古本的情況下，必會對狩谷望之影鈔本產生興趣，為了保住此本，只好再三保證必定「校讎」，以取得楊守敬的認可。不過，森立之雖然同意替楊守敬再三校讎影抄本，但此處所指的校讎，乃是根據古本比對後出的影抄本，縱使古本有誤字仍予保留，在影抄本中不另作更正。

明治十五年（清光緒八年，1882）三月，楊守敬向森立之詢問宋板《玉篇》、宋板《廣韻》二部共價為何？但經森立之告之原書已售予高木壽穎，楊守敬只好退而求其次，問翻刻本《玉篇》的情形：

楊守敬：「《玉篇》原本已售，無可言者。但公有翻本《玉篇》，以原本校其異同否？」

森立之：「《玉篇》、《廣韻》共以原本為貴，但原宋本誤字甚多，故以可貴。其誤字中可以取考者，往往而有之，清翻刻本則一一正誤字。吾今以清本為據，不復以宋版為貴。其誤字、正字，是可從、是不可從者，其見皆在於我，不可以善本為善也。是吾所立一見也。」

37 《清客筆話》，卷二，頁 529。

楊守敬：「固然，然公有校其異同之本否？」

森：「無全本也。」<sup>38</sup>

楊守敬再三與森立之確認此部《玉篇》清代翻刻本是否曾與原本校讎比對過？森立之的回答雖仍主張原本以誤字為貴，但在看到清代經過校讎「一一正誤字」的翻刻本之後，他的態度似乎有了轉變。於是說出：「吾今以清本為據，不復以宋版為貴。其誤字、正字，是可從、是不可從者，其見皆在於我，不可以善本為善也。」所謂「誤字、正字」，或者「可從、不可從」，皆取決於己，不可以善本為善的說法，事實上便是在兩人針對古本誤字改正與否的主張上逐漸取得折衷。森立之的回答既對「古本以誤字為貴」的態度上有所堅持，又適度地接納楊守敬注重校讎的想法。然論其本質，森立之仍然主張不應有任何更動為佳。

綜上所述，森立之與楊守敬對於不應更動古本誤字的態度上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對後出影鈔本或覆刊本應否更正誤字，則有不同主張。對森立之而言，影鈔本或覆刊本應完全依照原本的樣貌呈現，即使是誤字，仍應鈔覆，以保留原來面貌；但對楊守敬來說，由於看不到原書，只能從影鈔本或覆刊本推溯原貌，因此，對影鈔或覆刊本的正確性與否，很容易產生不安的存疑。再者，楊守敬自幼深受考據及校讎學的薰習，特別注重文字讎校的正確性與否，以致每得一影鈔或覆刊宋、元本，便再三推敲與考證，並細心校正訛誤處。正因為楊守敬此種根深蒂固的校讎學訓練，無形中造成日後他在纂輯《古逸叢書》時產生該「遵循古本」，抑或「校正古本」的矛盾心情。

#### 四、《古逸叢書》成書的轉折與落差

黎庶昌、楊守敬所編纂的《古逸叢書》乃覆刊自日本訪得宋、元古本而來，其中源自中土久已失傳的逸書，便有影舊鈔卷子原本《玉篇》、影舊鈔卷子本《玉燭寶典》、影舊鈔卷子本《文館詞林》、影舊鈔卷子本《瑯玉集》、影北宋本《姓解》、覆永祿本《韻鏡》、影宋本《史略》、影舊鈔卷子本《碣石調幽蘭》、影舊鈔卷子本《天台山記》、影宋本《大平寰宇記》十部；或收藏於東瀛而國內罕見的隋唐寫本或宋、元刻本，包括影宋蜀大字本《爾雅》（此本應為浙刻本）、影宋紹熙本《春秋穀梁傳》、覆元至

38 《清客筆話》，卷五，頁536。

正本《易程傳》、覆舊鈔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影宋台州本《荀子》、影宋本《南華真經注疏》、覆元本《楚辭集注》、覆宋本重修《廣韻》、覆元泰定本《廣韻》、影唐寫本《漢書食貨志》、覆麻沙本《杜工部草堂詩箋》十一部；或日本刊刻的中國古籍，即和刻本，像是覆正平本《論語集解》、集唐字《老子注》、仿唐石經體寫本《急就篇》三部；或日本自著的漢籍：影舊鈔卷子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一部；或未曾東傳的日本漢籍，即黎星使女婿張君沆得之的影宋蜀大字本《尚書釋音》一部，總計二十六部。<sup>39</sup>

然而，黎庶昌、楊守敬從日本蒐得的這些古本，幾無原書，皆是影鈔本或覆刊本。因此，當楊守敬「再覆刊」這批漢籍輯入《古逸叢書》，在未能擁有原書的情況下，勢必會對影鈔或覆刊本的正確性與否有所存疑，是以在付梓刷印過程中，不免會對內文反覆再三推敲，甚至予以校正。惟其校正之處，今人若非比對原書與影鈔或覆刊本之間的差異，實難看出具體成果。本節擬取《古逸叢書》定稿前後的單行及定本、楊守敬的親筆校樣本、日人影鈔本或覆刊本，以及原書逐一比對，從中考察楊守敬在覆刊過程中修正之處。

由於《古逸叢書》覆刊本依據的祖本已部份散逸，其餘部份又因度藏於日本各處，以致極難訪尋；此外，還須依據楊守敬親筆手校的初印校樣本進行比對，方能釐清楊氏校正之處，其難度之高，可想而知。慶幸的是，目前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典藏之中，其中三部正好有原刊本。值得肯定之處，此三部不僅是《古逸叢書》的前三部，並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版本類型：即影鈔宋蜀大字本《爾雅》、覆刊宋紹熙本《春秋穀梁傳》，以及覆刊日本正平年間（1346-1370，元順帝至正六年至明太祖洪武三年）的《論語集解》，是日本現存古老的《論語集解》和刻本。其版本內容詳如表一。

---

39 連一峰，〈黎庶昌、楊守敬《古逸叢書》研究〉，頁 80。

表一：故宮所藏《爾雅》、《春秋穀梁傳》、《論語集解》版本對照表

	書名	原書版本項	影鈔本或覆刊版本項	清光緒間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初印校樣本		《古逸叢書》清光緒九年黎氏校刊本(初印單行本)	《古逸叢書》清光緒十年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刊本(定本)
1	《爾雅》三卷	南宋國子監刊本	日本明治間影鈔南宋國子監本	第一次初印校樣本	第二次初印校樣本	影覆宋蜀刻大字本	影覆宋蜀刻大字本
2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宋紹熙二年建安余仁仲刊本	日本金澤文庫覆宋余仁仲萬卷堂刊本	無	無	覆宋紹熙刊本	覆宋紹熙本
3	《論語集解》十卷	日本後村上天皇正平間刊本	日本文化十三年市野光彥覆刊正平本	日本室町初覆刊正平本	覆刊正平本	覆刊正平本	覆刊正平本

### (一) 《爾雅》三卷

《古逸叢書》根據的《爾雅》版本，楊守敬認為應是「影鈔蜀大字本」，然該書實為南宋國子監本，應為浙刻本，而非蜀本。<sup>40</sup>此點，據昌彼得先生〈跋宋監本《爾雅》〉及〈關於《寶篋印陀羅尼經》及《爾雅》〉文中，皆明確指出，又說「按日本室町氏所刻《爾雅》，遵義黎氏又從之覆刊者，即祖此本。」而「此本」便是指故宮典藏的南宋國子監刊《爾雅》。<sup>41</sup>

因此，本節僅就故宮典藏：被視為祖本南宋國子監刊本、日本影鈔國子監本、楊守敬二次的初印校樣本，及在日本東京先後梓印的《古逸叢書》單行本、定本，總共六種《爾雅》版本之間的差異加以析究。據筆者初步比對，發現從南宋刊本的原書看起，到第一次的影鈔本，再到覆刻影鈔本的覆刊本，再經過楊守敬校樣後的本子，最後根據校樣後再覆刊的定本，是不可能出現完全相同的版本樣貌，但各版本之間的變化卻呈現出有趣的轉折。

首先，從版式上看，先取日本影鈔本比對南宋國子監祖本，雖可發現行款、字數、文字內容悉同原刊本，但影鈔本卷上及卷中並不繪版匡，且未題版心上方字數及下方刻工名；更重要的是，影鈔本的字體較原書細長，原書字體呈現豐肥端勁，影鈔

40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三，頁75。

41 據昌彼得先生考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此刻本原出於浙刻，而後版歸監中之南宋印本，然其版本淵源係覆刻北宋監本，而北宋監本又出於五代長興監本。詳見昌彼得，〈跋宋監本《爾雅》〉及〈關於《寶篋印陀羅尼經》及《爾雅》〉，收入《蟬菴論著全集》，頁608-610及頁397-398；另，又可見連一峰，〈黎庶昌、楊守敬《古逸叢書》研究〉，有詳細版本源流，頁129-131。

本則不然。據該影鈔本卷前有楊守敬跋，指出：「北宋刊本爾雅，日本東京高階氏所藏。……據此則此本當根源于長興本」；又《日本訪書志》記載：「此書據松崎明復云：是日本室町氏所刻，原本尚存東京高階氏。余嘗于黑田某所見之，果是日本重翻，字體校影鈔殊肥，黑田告余云：日本今存僅此一本。」<sup>42</sup>意即楊守敬在日本所看到的室町氏翻刻本，字體便是殊肥有勁，較之影鈔本更接近原書，但因為楊守敬未能取得原書，故僅能就手邊的影鈔本摹寫，並且覆刊。因此，筆者在比對楊守敬前後二次的初印校樣本，及日本東京刊刻《古逸叢書》的單行本及定本，發現字體可說幾乎全臨摹自影鈔本；然而，從楊守敬刻意補上影鈔本所沒有的版匡及版心（但版心未填上字數及刻工名），顯然認為原書既有版匡，影鈔本卻未忠實呈現原刊本面貌，故據以補上。

至於內容方面，由於楊守敬在第一次初印校樣本上，以朱、墨筆書寫校改，所根據者為明天順年間胡深注疏本及清朝馬國翰本。但再核對後來覆刊之《古逸叢書》單行本以及定本，卻發現楊氏並未全然依樣照改，僅就其中部份訛字加以修正；惟增加清朝嘉慶皇帝以下諸帝避諱缺筆，如道光皇帝的「寧」字，以及咸豐皇帝的「訖」字等，皆缺末筆。由於楊守敬在第一次及第二次初印校對本上，已經根據明、清《爾雅》注疏本修改訛字，其後又增加皇帝避諱缺筆，這些都是南宋原刊本所未見的現象，因此使《古逸叢書》原以影覆南宋國子監刊《爾雅》，望能達到「概還其真」的最初理念，即反映出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許多距離。

表二：《爾雅》版本對照表

	書名	版本項	行款	序跋	字體	諱字
1	《爾雅》三卷三冊 (故善 00331-1-003313)	南宋國子監刊本	每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小字雙行，字數二十一字。 版心上方有每葉字數；下方有刻工。	卷前有〈爾雅序〉；卷下最末二葉缺，為毛晉影鈔。	豐肥端勁	玄、弦、絃、朗、敬、弘、殷、匡、胤、頰、恒、楨、徵、貞、賴、曷、樹、桓、瑗、貳、購、邁、殼、慎、蜃缺筆（然避諱不嚴）宋光宗以下諸帝不避。
2	《爾雅》三卷三冊 (故觀 01177-4-011776)	日本明治間影鈔南宋國子監本	同上。 卷上及卷中皆不繪版匡；卷下繪有版匡。	卷前有〈爾雅序〉；扉葉有楊守敬手書題跋「北宋刊本爾雅，日本東京高階氏所藏。」	細勁瘦長	同上

42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三，頁75。

3	《爾雅》三卷一冊 (故觀 00940 5)	清光緒間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初印校樣本(第一校)(扉葉上鐫刻「遵義黎氏校刊」)	同上。 有版匡,然版心上方無字數及刻工。	卷前有〈爾雅序〉	細勁瘦長	有楊守敬朱墨筆手校改字之跡。
4	《爾雅》三卷一冊 (故觀 00940 6)	清光緒間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初印校樣本(第二校)(扉葉上「遵義黎氏校刊」經朱校)	同上。 有版匡,然版心上方無字數及刻工。	卷前有〈爾雅序〉	細勁瘦長	有楊守敬朱墨筆手校,並浮貼改字,以朱筆刪去寧、佇末筆。
5	影覆宋大字本《爾雅》三卷三冊 (故觀 00207 9-002110)	清光緒九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單行本(扉葉鐫刻「遵義黎氏校刊」)	同上。 有版匡,然版心上方無字數及刻工。	卷前有〈爾雅序〉;書末增加森立之及楊守敬跋。	細勁瘦長	除原有避諱字外,增加清道光皇帝的寧字,及咸豐皇帝的佇(佇)字缺末筆。
6	影覆宋大字本《爾雅》三卷三冊 (故觀 01476 3-014842)	清光緒十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定本(扉葉上鐫刻「光緒十年甲申遵義黎氏刊于日本東京使署」)	同上。 有版匡,然版心上方無字數及刻工。	卷前增加黎庶昌〈刻古逸叢書序〉。書末亦有楊氏及森氏跋。	細勁瘦長	除原有避諱字外,增加清道光皇帝的寧字,及咸豐皇帝的佇(佇)字缺末筆。

## (二)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古逸叢書》所覆刻的《春秋穀梁傳》，原刊本為宋紹熙二年（1191）建安余仁仲重刊本。<sup>43</sup>然其據以覆刻的臨摹本，卻僅來自影鈔，而非原刊本，其淵源根據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所敘：

原本舊為日本學士柴邦彥所藏，文政間，狩谷望之使人影摹之，纖毫畢肖，展轉歸向山黃村。余初來日本時，即從黃村求得之。慙慙星使何公重繙以傳，會瓜代，不果，暨新任星使黎公迺以付之梓人，踰年而後成。<sup>44</sup>

又，森立之《經籍訪古志》也說：「此本係柴學士邦彥舊藏，往年狩谷望之與松崎慊堂謀就阿波國學俾一書生影鈔，毫髮盡肖，宛然如宋槧。」<sup>45</sup>由上述可知，楊氏《古逸叢書》據以覆刊的底本，乃是日人狩谷望之派人影抄宋建安余仁仲刻本而來。

經筆者查找，發現故宮正好有一部宋紹熙建安余仁仲刊《春秋穀梁傳》，惟缺卷

43 連一峰，〈黎庶昌、楊守敬《古逸叢書》研究〉，頁132。

44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頁59。

45 森立之等撰，《經籍訪古志》，收入《書目叢編》，第58冊。

一至卷六；然並未見相關影鈔的宋刊本，倒是有一部日本金澤文庫覆刊宋余仁仲萬卷堂的本子。此部覆刊本在卷十二末有「余氏萬卷堂藏書記」方形木記，較原刊本多出一行「癸丑仲秋重校訖」，及余仁仲重刊題記一則：

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歸，含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度，若此者，眾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sup>46</sup>

由於該覆刊本有余仁仲的重刊題記，因此，據楊守敬推測，認為余仁仲萬卷堂所刻《春秋穀梁傳》僅康熙年間的何焯見過，但何氏所見僅為初印本，且未見卷一至卷六，而是自卷七開始；<sup>47</sup>此本「又仁仲覆校重訂者」，應為余氏重刊定本，益顯珍貴。<sup>48</sup>然而，由於該金澤文庫覆刊本中頗多楊守敬以朱筆校正，且重刻題記末原有「日本東京木邨嘉平刻」刻工名亦被刻意剷除；加上楊氏在《日本訪書志》敘述中即曾描述該覆刊本的蒐書源流，指出：

余從森立之得此書，立之自有跋在篋蓋裏面，稱此書為市野光彥舊藏，後歸澀江道純，是二人皆日本舊藏家。<sup>49</sup>

除此之外，楊守敬還以朱筆直接校改訛字，或將修改避諱之字以浮箋貼於其上。此本同樣對清帝名諱缺筆，然又較原刊本多避「丘」字，丘字是清雍正年間因朝廷尊崇聖哲孔子而刻意缺筆，或改成邱字而來。因此，筆者推測此本應是楊守敬覆刊自日本金澤文庫本，疑非初印本，此本極可能是第二次的印本；而後經過楊氏校正改樣，並成為刊刻《古逸叢書》所據的底本。根據筆者核對，此本經朱校後與《古逸叢書》的單行本及定本內容幾近相同，但尚未刻入楊守敬及森立之跋，卷末亦不附改正考異一卷。

46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四冊，日本金澤文庫覆宋余仁仲萬卷堂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7 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日本金澤文庫覆宋余仁仲萬卷堂刊本，卷七天頭處有楊守敬朱筆題字：「何焯校余本自此卷起，以上皆缺。」顯然清何焯校本乃自卷七開始，與故宮藏本缺卷一至卷六，不謀而合，顯知何焯當時所見即為此本。又，參（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收入《書目叢編》，指出：「何氏所見即屬此本，其字畫端謹，楮墨精妙，為當時初印佳本，雖非全帙，固足貴也」。卷五，頁 326-327。

48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頁 59。

49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頁 57。

由於故宮所藏為宋紹熙二年建安余仁仲的初刊本，並非楊守敬《古逸叢書》所據日本金澤文庫覆余仁仲重刊定本，因此在內容比對上，容或有疏漏之處，然仍可依照版式、行款及字體加以比對。筆者將院藏宋紹熙建安余仁仲初刊本、日本金澤文庫覆宋余仁仲萬卷堂的刊本，以及《古逸叢書》二次刊印本加以比較，確實可以看出原來的金澤文庫本，不論行款、字體，甚至書中內容，皆悉同森立之稱「毫髮盡肖，宛然如宋槧」，若非覆刊金澤文庫的藏書章，實無法使人瞭然遽辨。此與日人森立之不斷強調古本以誤字為貴，冀能保留原書面貌的理念實不謀而合；然而，考察楊氏朱校修改處，其卻在訛字，以及帝王、聖哲名諱處刻意缺筆，再度反映出與楊氏期能「概其還真」的理念，顯然仍有落差。

表三：《春秋穀梁傳》版本對照表

	書名	版本項	行款	序跋	字體	諱字
1	《春秋穀梁傳》存六卷二冊（缺卷一至卷六）（贈善 003 087-003088）	宋紹熙二年建安余仁仲刊本	每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七字，每章附音義，每卷末有傳經注及音義字數。	卷十二末有長方木記：「余氏萬卷堂藏書記」	字體細長骨勁（似柳體字）。	玄、弘、匡、恒、桓、貞、慎字缺末筆。
2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四冊（故觀 004 653-004656）	日本金澤文庫覆宋余仁仲萬卷堂刊本	同上。附刻「金澤文庫」藏印	卷一前有〈春秋穀梁傳序〉；卷十二末有何休序，木記後較原刊多出「癸丑仲秋重校訖」；序末有余仁仲重刊序。	細長骨勁	除原避諱字外，經楊守敬朱墨筆校字，將丘（原刊不避）、徵（原刊本未避）、寧（原刊本未避）末筆劃去，並以浮箋貼上缺筆字。
3	影宋紹熙本《穀梁傳》十二卷附考異一卷（故觀 002 079-002110）	清光緒九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單行本	同上。	序跋與前書略同，然余仁仲重刊序後保留「日本東京木邨嘉平刻」；又多出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跋，暨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跋及考異一篇。	細長骨勁	除原避諱字外，丘（原刊不避）、徵（原刊本未避）、寧（原刊本未避）等字皆避。
4	影宋紹熙本《穀梁傳》十二卷附考異一卷（故觀 014 763- 01484 2）	清光緒十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定本	同上	同上。附考異一篇。然將森立之《日本訪書志》跋移至最末。	細長骨勁	除原避諱字外，丘（原刊不避）、徵（原刊不避）、寧（原刊不避）皆避。

### (三) 《論語集解》十卷

《古逸叢書》所收《論語集解》為楊守敬根據日本正平年間的和刻本所覆刊而成。此正平本《論語集解》版本古稀，歷來有關版本源流及價值論述頗多，此處不擬贅述。<sup>50</sup>本節僅就故宮所藏日本後村上天皇正平間刊《論語集解》的原刊本、覆刊本，以及影鈔本比對分析。

查故宮所藏日本後村上天皇正平間刊《論語集解》有三部：分別為清人田吳炤藏本、室町時期覆刊正平本、文化十三年（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市野光彥覆刊正平本；<sup>51</sup>影鈔本一部；另有楊守敬根據正平甲辰（日本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即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覆刻本作為《古逸叢書》的初印校樣本，以及光緒九年《古逸叢書》單行本、光緒十年定本，總計七部。

故宮所藏正平間刊本三部之中，其中一部原為線裝，後改成蝴蝶裝的《論語集解》。其紙墨洵古，雕鏤精工，應為故宮典藏的較早刊本。書中有日人墨筆音訓，首冊末頁亦有日人署名，以及清人田吳炤（字潛山）的手書題識：

己酉（筆者按：疑即宣統元年，1909）秋，遊京都若林書肆，得正平論語木板一方，書賈出此對照，一一符合，以其索價過昂置之。庚戌，春重遊書肆，詢之尚在，遂持歸，改為蝴蝶裝，古味盎然，洵可珍之祕笈也。潛山題記。（下鈐「景偉慶主人讀書記」朱方印）

由於田吳炤在清光緒二十四到二十五年（1898-1899）赴日留學兩年，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被派到日本擔任留學生監督及使館參贊；至宣統三年（1911）始行返國。此書顯然是在他回國前二、三年購自日本書肆。據筆者與日本文化十三年市

50 關於日本正平間刊《論語集解》，除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論語集解》題跋、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論語集解》跋外，中日學者皆有專論分別探討，如（日）川瀨一馬，〈正平論語考〉，《日本書誌學研究》，頁1609-1695；昌彼得，〈《論語》版本源流考析〉，收入《蟬菴論著全集》，頁590-603；劉昌潤，〈日本正平論語集解源流〉，頁260；（日）橋本秀美，〈日本古代《論語》學資料及其研究〉；以及（日）高橋智，〈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觀海堂舊藏日本古鈔本《論語集解》之價值〉等文，皆可參考。

51 市野光彥覆刊正平本的版本項，依嚴紹盞，《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上冊，〈經部〉，《論語集解》卷末附《正平本論語札記》題「文化十年癸酉冬十月江戶市野光彥識」，應定為光格天皇文化十年（1813）刊本，頁200；然據故宮所藏版本，該書〈論語序〉前又有日本文化十三年二月狩谷望之序，敘明「正平刻本，傳世絕少，學者或不能見，友人市野迷庵憂其如此，捐貲翻影，以公于世，別作札記，附之卷末。」顯然狩谷望之序與札記同刊一書之內。市野光彥覆刊本的刊刻時間應至文化十三年較為正確。

野光彥覆刊正平本比對，發現兩書除字體點畫略見歧異外，版匡行款及文字內容全然相同。而市野光彥覆刊的正平本，有小島尙質以古卷子本朱校筆跡，該書卷二、卷三末即有小島氏的手書題識，說明校正經過及版本源流：

（卷二末）弘化三年歲次丙午暮春二十九日，從卷子改帖古本朱校，同異於上層。此本上二帖，紙墨最古，洵為六七百年外古鈔；而下二帖，觀應元年權律師豪俊所鈔補也。質識。

（卷三末）弘化三年歲次丙午孟夏之月，據古卷改帖本朱校其本，卷首至此，體式一同，斯本實為六朝舊本轉傳之真。而〈述而〉以下，蓋據宋時改竄本補鈔者，固不可為據彼以改，是正平善本也矣。質識。<sup>52</sup>

由此可見，在小島氏的眼中，市野光彥覆刊的正平本與原刊本極為近似；但對楊守敬來說，在字體點捺之中，市野光彥的覆刊本仍有小瑕，楊氏指出：

文化間江戶市野光彥以此本翻雕，惜梓人未良，失原本古健之致，又印行不多，板亦旋毀。今星使黎公訪得原刊本上木，一點一畫，模範逼真，非顯有訛誤，不敢校改。<sup>53</sup>

因此，《古逸叢書》用以覆刊《論語集解》的底本，顯然非市野光彥的覆刊本。筆者取《古逸叢書》的初印校樣本、單行本、定本，與日本正平本、覆刊本及影鈔本互為比對結果，發現除影鈔本略見誤字外，其餘版本皆悉如原刊本，並無過多校改。唯一更改之處，大概仍是楊守敬在避諱字上的堅持，此書仍避清帝諱，尤以玄、寧二字最為常見。

以上敘述，既反映出楊守敬對刻工雕鏤的要求相當嚴謹；另一方面，楊氏希望能讓世人知道，其與黎庶昌所編刻的《古逸叢書》，不僅雕鏤精工，力求肖近原書，並且聲稱「非顯有訛誤，不敢校改」。此則體現出楊氏在覆刊古本時，對於板匡、行款、字體筆畫，皆力求與原書相符；惜在面對內容訛字、清帝避諱時，仍無法達到「與原書不差絲毫」的理想境界。

52 見《論語集解》，日本文化十三年市野光彥覆刊正平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3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二，頁65。

表四：《論語集解》版本對照表

	書名	版本項	行款	序跋	字體	諱字
1	《論語集解》十卷五冊 (平圖 000534-0005 38)	日本後村上天皇正平間刊本	每半葉六行、行十三字、小字雙行、字數同。	卷前有〈論語序〉；各卷末記有經、註文字數。首冊末扉葉有明治四十二年(己酉, 1909)日人手跋；以及田吳炤(潛山)手書題識。	帶有歐陽詢剛勁險峻的碑體字風格 書中有日人(不詳何人)墨筆訓讀及朱筆圈點。	卷端首行下為「九十六章」, 章字缺末筆。玄、寧字不避。
2	《論語集解》十卷五冊 (故觀 002026-0020 30)	日本室町初覆刊正平本	同上	卷前有〈論語序〉	同上。	卷端首行下為「九十六章」。 玄、寧不避。
3	《論語集解》存八卷三冊 (故觀 002018-0020 20)	日本文化十三年(清嘉慶二十一年, 1816)市野光彥覆刊正平本	同上 首冊卷第三版匡外多出刻工名「朝虎風刻」	卷前有〈論語序〉；序前附刻文化十三年狩谷望之跋；書眉有小島尚質以古卷本朱筆校正之語, 末並有小島尚質朱筆手書題記。	與編號1相同。	卷端首行下為「九十六章」, 章字缺末筆。 章字下有小島尚質朱筆寫「昌平原刊」。 玄、寧不避。
4	《論語集解》十卷五冊 (故善 002610-0026 14)原藏昭仁殿	影鈔日本正平本	無匡格欄線, 行款字數同上。	卷前有〈論語序〉；卷十末有「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 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等字。	與編號1字體不同。	卷端無「九(凡)十六章」四字；且文中頗多誤寫。 玄、寧不避。
5	覆正平本《論語集解》十卷二冊 (故觀 002021-0020 25)	清光緒九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初印校樣本	每半葉六行、行十三字、小字雙行、字數同。	卷前有〈論語序〉；卷十末有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題跋, 紙墨如新, 初印本。	與編號1相同。	卷端題「論語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九十六章」。
6	覆正平本《論語集解》十卷二冊 (故觀 002079-0021 10)	清光緒九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單行本	同上	卷前有〈論語序〉；卷末較前書多出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跋。	與編號1相同。	卷端無「九十六章」, 章字不缺筆。 玄、寧缺筆。
7	覆正平本《論語集解》十卷四冊 (故觀 014763-0148 42)	清光緒十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定本	同上	卷前有〈論語序〉；卷末森立之跋與楊守敬跋順序互換。	與編號1相同。	卷端無「九十六章」, 章字不缺筆。 玄、寧缺筆。

## 五、結 語

由上述可知，版本學上所謂「影鈔」或「覆刊」的定義，不論從行款格式到字體點畫，都應與原書完全一致。換言之，在影鈔或覆刊漢籍的過程中，對於外觀上的要求極為重視，舉凡版式、行款，或字體，而最理想的境界便是字體上的傳神精妙，更有以此認定是否達逼肖原書、宛如原刊的地步；而在內容上，則認為凡依樣影覆，並不會造成差錯，因此並未予以嚴格的界定。

然而，本文透過各種版本的比對，從原刊本、覆刊本、影鈔本到黎庶昌、楊守敬輯刻《古逸叢書》的校樣本、單行本，以至定本，便可發現到漢籍經過影鈔或覆刊，不論在外觀，或內容，都可看出最後定本與原刊本之間確實存在若干的差異性，幾乎不可能達到絲毫不差的理想境界；若影鈔或覆刊次數越多，則與原刊本相距愈遠。黎庶昌在影覆宋本《爾雅》敘目中曾說：「此書未有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一行，為蜀本真面目最可貴。宋諱闕慎字，其為孝宗後繙刻無疑。日本再繙之，今天從再繙本影雕，展轉撫摹，僅存郭廓而已。」此處的「展轉撫摹，僅存郭廓而已」，實深切道出古本經過影鈔或覆刊後所面臨的先天侷限性。

楊守敬為《古逸叢書》耗盡心力，運用影覆方式使其「概還其真」的做法，雖然面臨各種困難與侷限性，但他不畏艱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在促進域外漢籍回流中土的貢獻上，不論是精神與勇氣，皆值得後人肯定。不過，當楊守敬在蒐書過程中，深知域外漢籍珍稀難得，卻未必皆可購藏，遂退而求其次，以影鈔或覆刊仿得原刊本的用意雖佳，惜在覆刊過程中，並未「遵循古本」，而採取「校正古本」的決定，以致造成日後難以彌補的遺憾。此不禁令人懷疑，楊守敬所謂的「真」，究竟所指為何？

本文透過《清客筆話》還原當時楊守敬與日人森立之的對話，得知森立之不時以「古本以誤字為貴」觀念告訴楊守敬，楊氏雖然未表達反對，但由於楊氏受到長期以來考據學與校讎學的訓練，加上身為駐日公使隨員的官方身份，在受制於政治身份及現實考量的情況下，決意校改訛字及避清帝名諱。此舉透露出楊氏對於影鈔或覆刊以「還真」原書的主張，還是著重在外觀上的要求，包括版匡、行款及字體上的形似傳神；在內容上則認為應該校改，使其不訛。簡而言之，楊守敬「概還其真」的理念，是指外觀形似上的「真」，然內容是否依循古本，則因受到所學及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未能還「真」。是以長澤規矩也教授〈古逸叢書の信憑性について〉

對《古逸叢書》提出的批判，便是針對楊守敬擅改古本的指責。

確實，根據版本學上的定義，楊守敬並未遵照影鈔或覆刊原書的客觀原則，反而加入個人的主觀判斷，予以校改訛字、避諱缺筆，以致形成日後的爭議。事實上，楊守敬到了七十四歲時，回想起此事，曾經感歎地說道：

故近時顧千里創為「以不校校之」之說，雖明知其誤，亦不輕改，以待學者之研求，誠刻書者之善法，而讀書者之良規也。憶余在日本，初晤森立之（著有《經籍訪古志》），以古刻書相質，余謬言此書訛誤滿紙，雖古刻未為奇也。立之艷然曰：「君於古書未也，書無訛字，尚何足貴乎！」余乃相視而笑，以立之為知言。<sup>54</sup>

對照他當時赴日刻《古逸叢書》為之校改的做法，雖然今天看來為時已晚，但也透露出楊氏晚年在顧千里的倡導下，最終認同森立之「古本以誤字為貴」的主張。

晚清之際，中日文人因透過外交途徑而有密切接觸的機會，蒐求漢籍意外成了外交之外的交流管道。楊守敬與森立之藉由筆談，表達雙方對影鈔或覆刊漢籍的主張，當時森立之的主張雖未影響到楊守敬，但從楊氏晚年認同森立之所言為是的感慨看來：《古逸叢書》的刻就，反映出楊守敬赴日校刻古籍的過程中，在面臨「尊古」或「勘古」的兩難困境時，內心曾經有過極大的掙扎與抉擇，雖然最後在承受政治現實與學術訓練的雙重壓力下，對於「概還其真」有所折衷。即使時至今日，中日學者們在看待《古逸叢書》時，還是正反不一的評價，但對於楊守敬耗費心力，努力促進域外漢籍回流中土的用心；以及中日文人之間經由書籍之間的流動與傳播，所逐漸建立難以切割的文化情誼，仍應給予相當的認同與肯定。

後記：本文曾於 2009 年 11 月 6 至 7 日東吳大學中文系及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共同主辦的「第一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原文為〈故宮觀海堂藏書之影鈔及覆刊漢籍探析——以黎庶昌、楊守敬《古逸叢書》為考察重心〉。本文的完成，首先感謝會中評論人臺灣大學趙飛鵬教授的建議及指正；另，圖書文獻處鄭永昌先生在日文資料解讀上提供協助，及周維強先生、陳暉仁先生提供書籍及版本的相關資料；最後，誠摯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謹申謝忱。

54 楊守敬，《鄰蘇老人手書題跋》，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八冊，〈宋蜀大字《史記》跋〉，頁 1119。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魏) 何晏集解，《論語集解》，十卷，日本文化十三年市野光彥覆刊正平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魏) 何晏集解，《論語集解》，十卷，日本室町初覆刊正平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魏) 何晏集解，《論語集解》，十卷，收入《古逸叢書》，清光緒九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單行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魏) 何晏集解，《論語集解》，十卷，清光緒間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初印校樣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魏) 何晏集解，《論語集解》，十卷，影鈔日本正平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魏) 何晏集解，《論語集解》，十卷，日本後村上天皇正平間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魏) 何晏集解，《論語集解》，十卷，收入《古逸叢書》，清光緒十年甲申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晉) 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宋紹熙二年建安余仁仲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晉) 范寧集解，(清) 黎庶昌編，《春秋穀梁傳》，十二卷，收入《古逸叢書》，清光緒九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單行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晉) 范寧集解，(清) 黎庶昌編，《春秋穀梁傳》，十二卷，收入《古逸叢書》，清光緒十年甲申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晉) 范寧集解，《春秋穀梁傳》，十二卷，日本金澤文庫覆宋余仁仲萬卷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晉) 郭璞注，(清) 黎庶昌編，《爾雅》，三卷，收入《古逸叢書》，清光緒九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單行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晉) 郭璞注，(清) 黎庶昌編，《爾雅》，三卷，收入《古逸叢書》，清光緒十年甲申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晉) 郭璞注，《爾雅》，三卷，日本明治間影鈔南宋國子監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晉) 郭璞注，《爾雅》，三卷，南宋國子監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晉) 郭璞注，《爾雅》，三卷，清光緒間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第一次初印校樣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晉) 郭璞注，《爾雅》，三卷，清光緒間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第二次初印校樣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于敏中、彭元瑞等，《天祿琳琅書目·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清)孫從添，《藏書紀要》，收入《書目續編》，臺北：廣文書局，1968。
- (清)陳矩，《東游文稿》，收入《靈峰草堂集》，清光緒間貴陽陳氏刊本。
- (清)傅雲龍撰，《游歷日本圖經》，收入王寶平主編，《晚清東游日記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清)楊守敬，《鄰蘇老人手書題跋》，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
- (清)楊守敬自撰，《日本訪書志》，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
- (清)楊守敬自撰、弟子熊會貞補疏，《鄰蘇老人年譜》，香港：存萃學社編，1974。
-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重印本。
-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收入《書目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67。
- (清)黎庶昌、楊守敬編，《古逸叢書》，清光緒十年甲申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森立之等撰，《經籍訪古志》，收入《書目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67。

森立之撰、陳捷整理，《清客筆話》，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

## 二、近代論著

王鐵策，〈楊守敬與森立之的《清客筆話》〉，《文獻》，1996年第2期。

出版詞典編輯委員會編，《出版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

石田肇著，孔繁錫譯，〈《古逸叢書》的刊刻及刻工木村嘉平史略〉，《貴州文史叢刊》，1992年第3期，頁41-53。

吳天任，〈楊守敬與《古逸叢書》的校刻〉，《大陸雜誌》，32卷10期，頁23-26。

宜昌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宜都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楊守敬學術年譜》，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屈萬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訂，《圖書板本學要略》，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1986。

昌彼得，〈《論語》版本源流考析〉，收入《蟬菴論著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590-603。

昌彼得，〈跋宋監本《爾雅》〉，收入《蟬菴論著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608-610。

昌彼得，〈關於《寶篋印陀羅尼經》及《爾雅》〉，收入《蟬菴論著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397-398。

高橋智，〈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觀海堂舊藏日本古鈔本《論語集解》之價值〉，《故宮學術季刊》，25卷4期，2008年夏季，頁107-134。

- 連一峰，〈黎庶昌、楊守敬《古逸叢書》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 陳東輝，〈《古逸叢書》與中日漢籍交流〉，收入《近現代新編叢書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頁 19-34。
- 趙飛鵬，〈《經籍訪古志》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學研究》，第 8 期，1994。
- 趙飛鵬，〈楊守敬之藏書及其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 劉昌潤，〈日本正平論語集解源流〉，《文史》，第 18 期，1983。
- 橋本秀美，〈日本古代《論語》學資料及其研究〉，《原學》，第 2 輯，1994。
- 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
- 瞿冕良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山東：齊魯書社，1992。
- 嚴紹盪，《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川瀨一馬，〈正平論語考〉，《日本書誌學研究》，東京：講談社，1971，頁 1609-1695。
- 川瀨一馬，〈森立之·約之父子〉，《日本書誌學之研究》，東京：講談社，1971，頁 775-842。
- 石田肇，〈楊守敬と森立之〉，《書論》，1990。
- 長澤規矩也，〈《清客筆話》—楊守敬と森立之との筆談〉，收入《長澤規矩也先生古稀記念·圖書學論集》，東京：三省堂，1973。
- 長澤規矩也，〈古逸叢書の信憑性について〉，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 1 卷，東京：汲古書院，1982，〈書誌學論考〉，頁 489-502。
- 原田種成，〈《清客筆話》—楊守敬と森立之との筆談〉，收入《長澤規矩也先生古稀記念·圖書學論集》，東京：三省堂，1973。
- 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東京：汲古書院，2003。

##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wards Copies and Reprints of Chinese Books: with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of *Guyi Congshu* by Yang Shoujing as an Example**

Hsu Yuan-ting

National Palace Museum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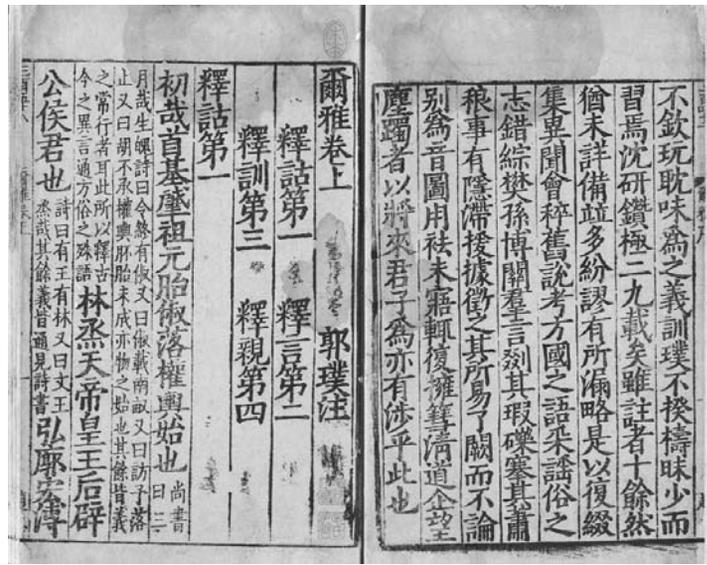
In 1880, the six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Guangxu, Yang Shoujing (born in Yidu, Hubei Province) was sent to Tokyo as attendance of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Japan and begun to collect old Chinese books widely scattered all over Japan. During the short period of only two years, Yang Shoujing with the help of his Japanese friends Mori Risshi and Mukoyama Koson then managed to acquire 26 old and rare work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editions. Initially, he preserved the appearance of the original works by copying and reprinting them. Finally, he resorted to “reprinting the reprint” by editing and publishing it in the *Guyi Congshu* (Collection of Books from the Far Past).

By using Yang Shoujing’s *Guyi Congshu*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differences of views and position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intellectuals on the issue of copying and reprinting old Chinese books. The article will first clarify the definition and notion of copies and reprints and through the book *Qingke Bihua* will then analyse the discussion of Yang Shoujing and his Japanese friend Mori Risshi on the subject of copies and reprints. Finally, the three parts of *Guyi Congshu*, namely *Erya* (Luxuriant and Refined Works), *Chunqiu Guliangzhuan* (Guliang’s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Lunyu Jijie*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ill then be contrasted with the original edition copie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 publication of *Guyi Congshu* not only reflects the limitations from numerous external conditions that Yang Shoujing was faced with in the process of reprinting old books, it also reflects his extreme inner conflicts and the difficult choices he had to make when he faced the dilemma of “respect for the old” vs. “correction of the old”. Even up 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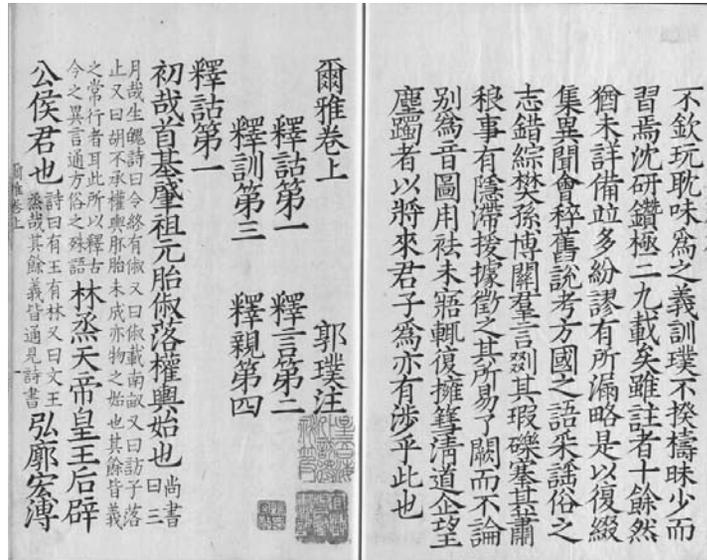
his day,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have vary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appraisals towards *Guyi Congshu*. However, th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Yang Shoujing's exhaustive efforts to bring about the return of old Chinese books from abroad back to China, deserves recognition and affirmation. (Translated by Günter Whittome)

**Keywords:** Yang Shoujing, Mori Risshi, Book Copies, Reprints, The Circul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books, *Guyi Congshu*



原刊本「弘」字不避諱

圖1 爾雅 南宋國子監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影鈔本「弘」字不避諱

圖2 爾雅 日本明治間影鈔南宋國子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古逸叢書初印一校本  
「弘」字不避諱

圖3 爾雅 清光緒間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初印校樣本（第一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校本「弘」字缺筆，避乾隆皇帝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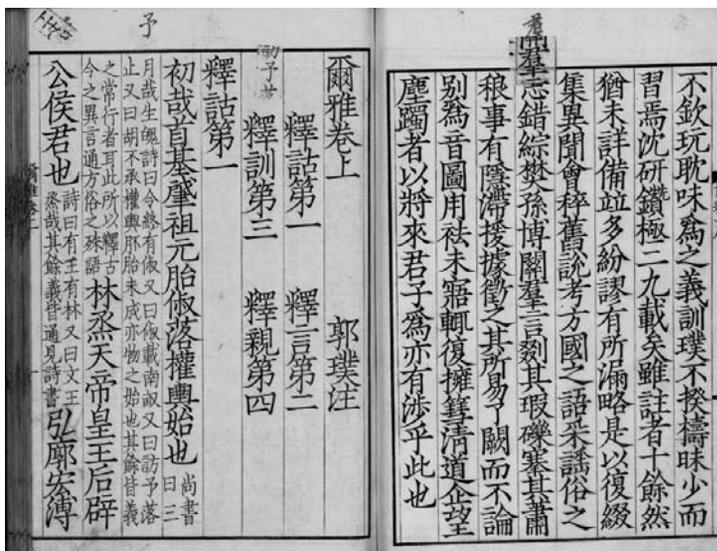


圖4 爾雅 清光緒間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初印校樣本（第二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單行本「弘」字缺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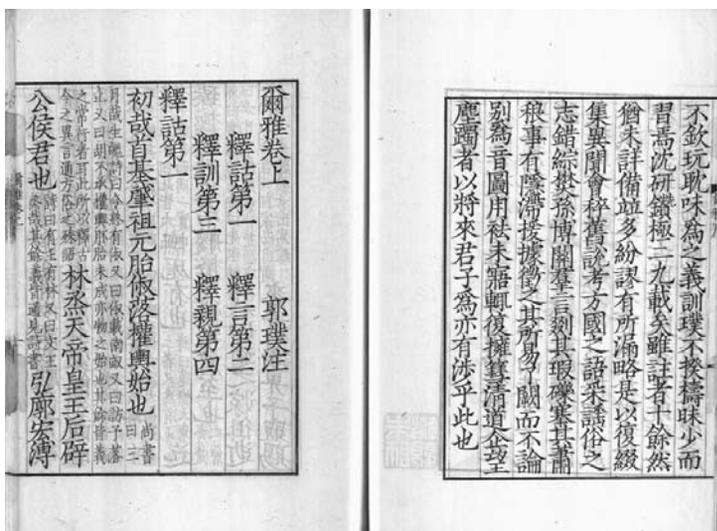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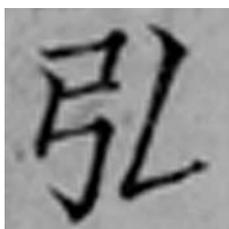


圖5 爾雅 清光緒九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單行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定本「弘」字缺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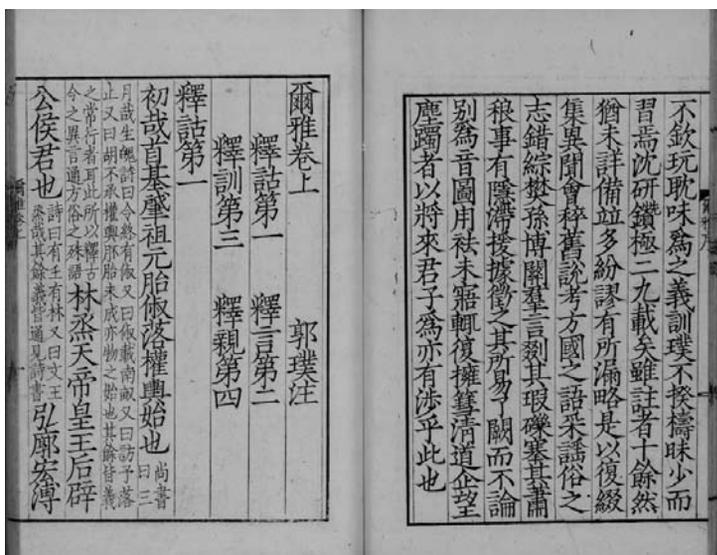


圖6 爾雅 清光緒十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定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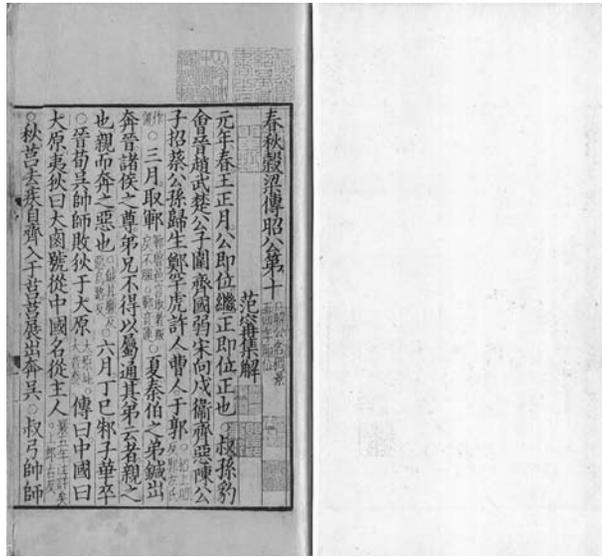


圖7 春秋穀梁傳 宋紹熙二年建安余仁仲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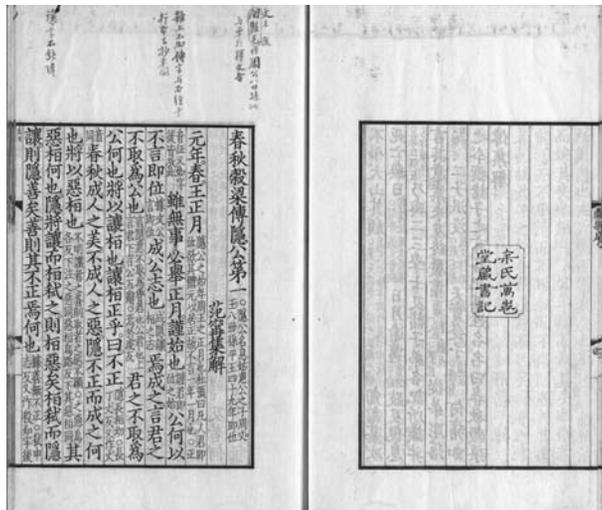


圖8 春秋穀梁傳 日本金澤文庫覆宋余仁仲萬卷堂刊本  
(卷前有「余氏萬卷堂藏書記」牌記，書眉多處楊  
手敬朱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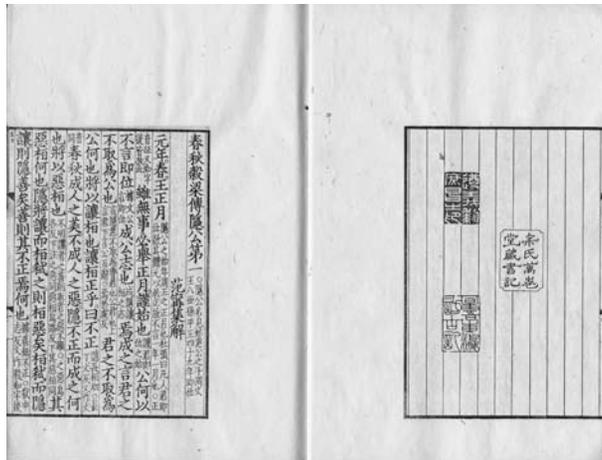


圖9 春秋穀梁傳 清光緒九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單行  
本(卷前余氏牌記旁附刻「遵義黎庶昌之印」及  
「星吾東瀛訪古記」長方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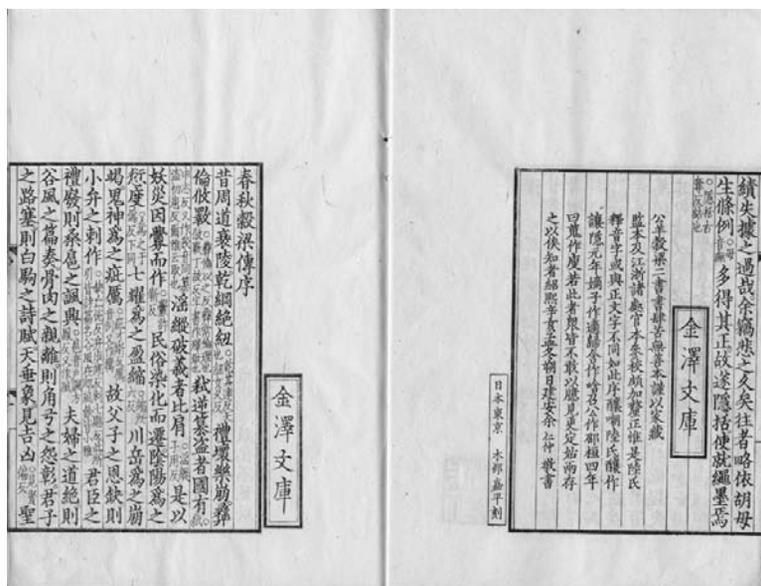


圖10 春秋穀梁傳 清光緒十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定本（序前附刻余仁仲木記，未有「日本東京木郵嘉平刻」）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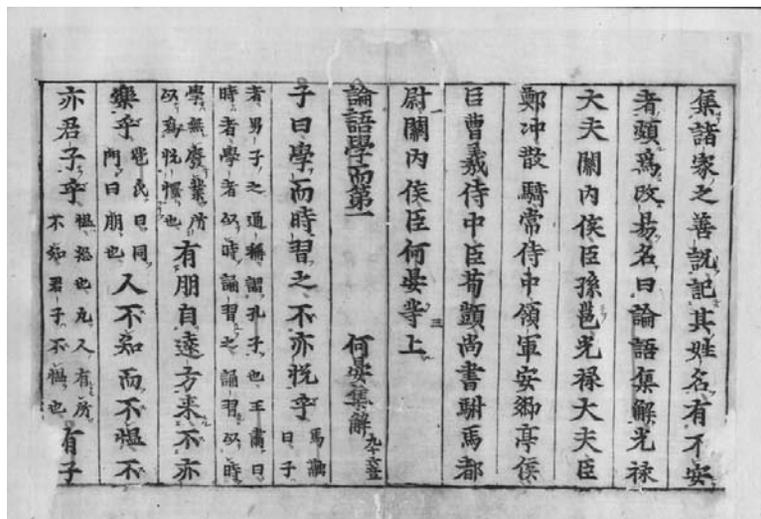


圖11 論語集解 日本後村上天皇正平間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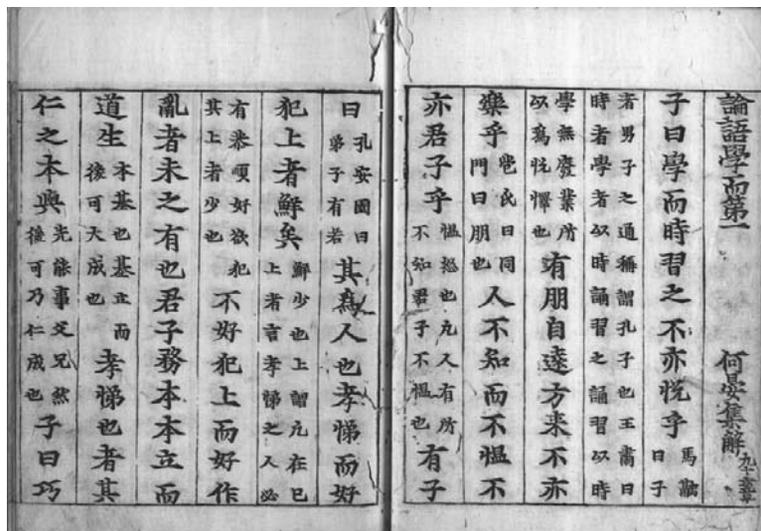


圖12 論語集解 日本室町初覆刊正平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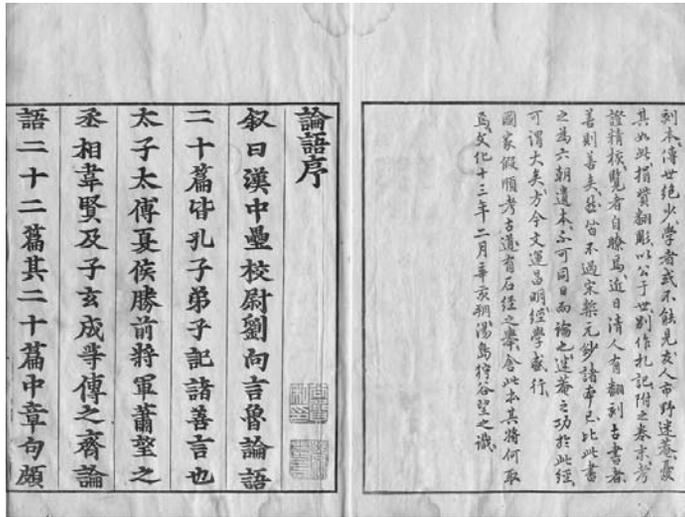


圖13 論語集解 日本文化十三年（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市野光彥覆刊正平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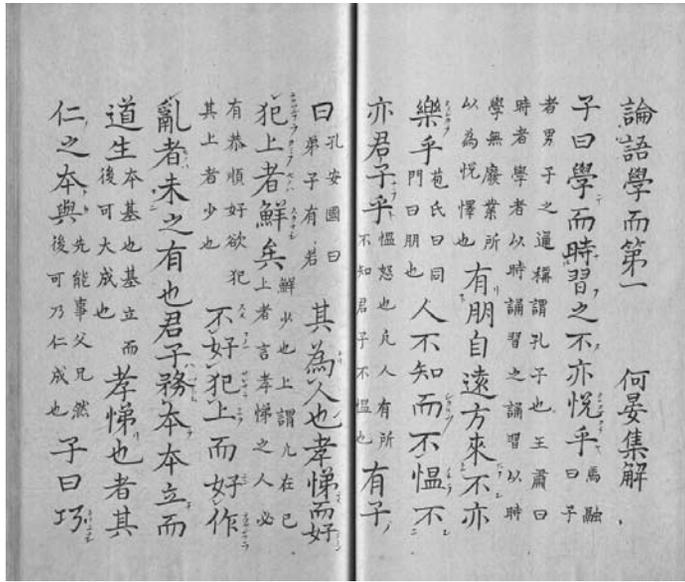


圖14 論語集解 影鈔日本正平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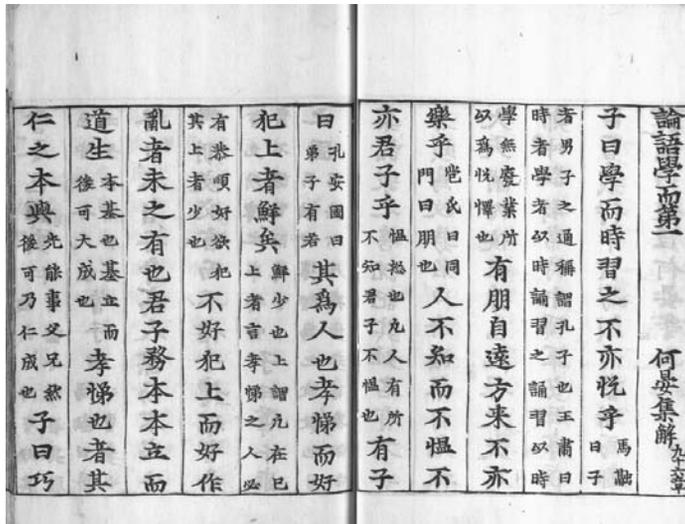


圖15 論語集解 清光緒九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初印校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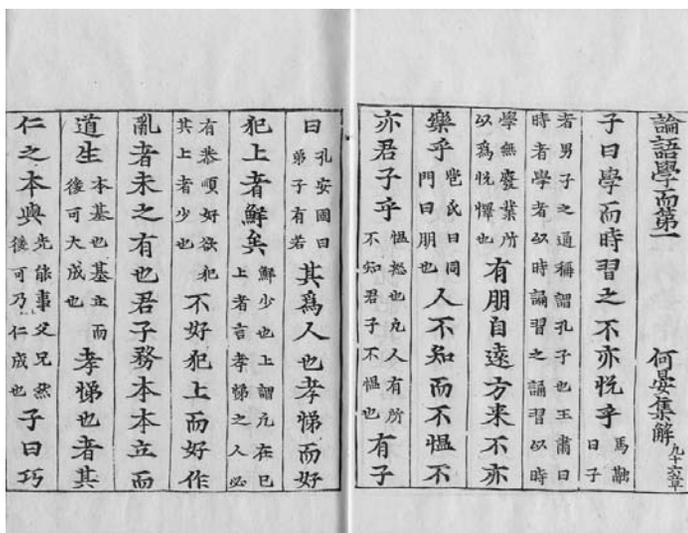


圖16 論語集解 清光緒九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單行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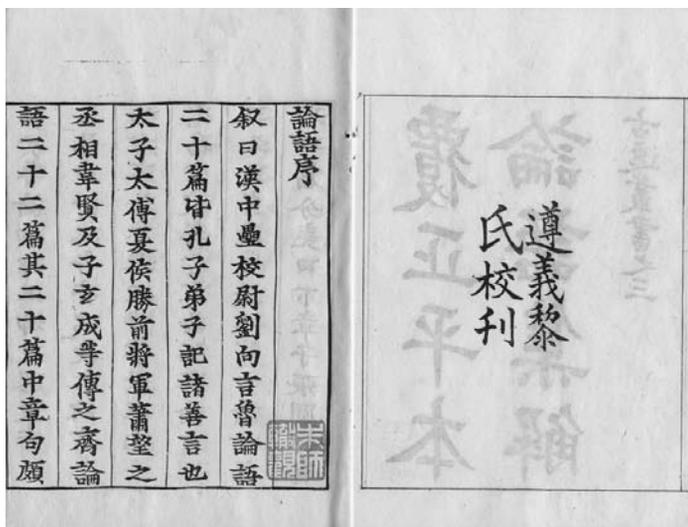


圖17 論語集解 清光緒十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定本（序前扉葉 鐫刻「遵義黎氏校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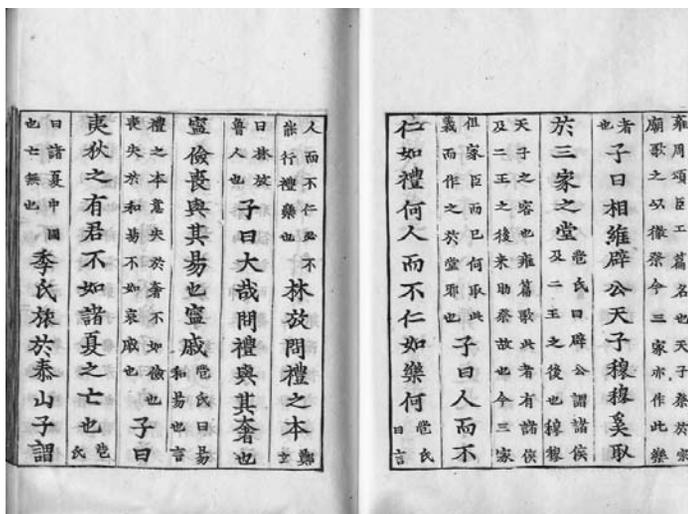


圖18 論語集解 清光緒十年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定本（此本避 清道光皇帝諱，文中「寧」字缺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